

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

列子全译

王强模 译注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

列子全译

王 强 模 译注

贵 州 人 民 出 版 社

出版说明

中华民族有数千年的文明历史，产生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。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，而且对今天在全民族弘扬爱国主义思想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。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，已成为世界文化宝藏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不仅是中国的骄傲，也是全人类的骄傲。

然而，我国浩如烟海的古代文化典籍，由于时代的变异，语言的古奥，现代社会的多数人已难识其庐山真面目。为了继承我国优秀文化遗产，我们在全中国学术界著名专家的支持下，出版了这套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。

这套丛书本着推陈出新、汇聚英华、弘扬传统、振兴华夏之宗旨，化艰深为浅显，熔译注于一炉，既能使广大读者了解我国古代各名著的全豹，又有利于中外文化之交流。丛书精选我国历代经史子集四部名著 50 种（有个别数种合为一书），以全注全译形式整理出版。在书目的取舍上，我们首先重点选取我国古代哲学、历史、地理、文学、科技各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不可朽巨著，又兼及历史上脍炙人口深入人心的著名选本；既考虑到所选书目为广大读者应该了解并使之世代流传下去，又顾及各书是否能全部译成现代汉语的实际情况。根据上述原则，我们对经部、子部之书选取较多；史部则重点选取具有权威性的编年体通史《资治通鉴》，而对二十四史暂付阙如；在集部着眼于一些有代表性的总集或选集，对历代文人的众多别集暂只译一种作为尝试。

这套丛书以具有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广大读者为对象，不仅从前言到注释及译文均吸收了历代学者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，而且均附有业已精校的原文，在强调通俗性的同时，也重视学术性与资料性，可以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的一种新的尝试。

我们相信，这套丛书的问世，对传播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，提高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，从而振奋精神去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，将起到应有的作用。

贵州人民出版社文史编辑室

1990年9月

ELP/26

前 言

《列子》是一部奇书。

它之奇，一是不明作者，甚至有人根本怀疑有无列子其人。说此书为列子本人所撰者有之，说此书为秦汉时老庄之徒所撰者有之，说此书为汉代人、为魏晋人假托列子之名而撰者有之，说此书就是作注者张湛所伪造者有之。二是内容较为驳杂。有人认为它倾向于道家，有人认为它思想颓废、放纵情欲，有人认为它对黑暗丑恶的社会进行了抨击，有人则认为它思想体系混乱，诡谲荒诞。三是寓言故事特别多，全书有寓言故事 102 个，这在诸子中是少见的。

下面谈谈对这部书的一些看法。

列 子 考 略

列子其人究竟有无，是“列学”争论的一个焦点。

怀疑列子是虚构的人物，有下列三条主要根据：

其一，列子既然活跃在春秋末战国初，学术上为道家流派，显然是道家极为重要的人物，然而，我国汉代最著名的史学典籍《史记》，却只字未提到列子。司马迁不提列子，证明史学家的谨慎，证明史学家已经怀疑列子的有无。

其二，在《庄子》一书中有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《天下》，也

没有提到列子。为什么在评述各学术流派时，庄周恰恰把列子忽略了？荀子的《非十二子》，列举先秦学术流派中十二人，同样没有提到列子，这些都说明列子的存在值得怀疑。

其三，西汉著名文人刘向，曾为《列子》作序，称“列子者，郑人也，与郑繆公同时，盖有道者也。”一句“与郑繆公同时”，引来许多非议。唐代柳宗元首先指出其时代的错讹，认为刘向宏博精审，错讹不可能发生，只因列子无考所致。而且，在《列子》一书中，还有“杀子阳”之言。若如此，列子与郑子阳同时。子阳被杀，时在周安王（姬骄）四年（公元前398年）。但是，书中又言公孙龙之事。公孙龙出生于子阳后百余年。书中又言宋康王事，宋康王又后于公孙龙十多年。列子当然不可能知道公孙龙和宋康王之事，而《列子》却写了，可见列子其人的存在值得怀疑。

列子是否确有其人呢？

列子确有其人，而且是先秦道家学派的重要人物。其理由如下：

虽然《史记》、《庄子·天下》、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等重要书籍和文章未提列子，但是，在《吕氏春秋》一书中却提到，而且有精要的评述：

老聃贵柔，孔子贵仁，墨翟贵廉，关尹贵清，子列子贵虚，陈骈贵齐，阳生贵己，孙臧贵势，王廖贵先，儿良贵后。

——《审分览·不二》

“子列子”即为列子。在《吕氏春秋》中是肯定列子存在的。《吕氏春秋》内容之可信，已为学术界所肯定。而且“子列子贵虚”一句，恰到好处地指出了列子学术思想的精髓，这又证明，《不二》篇的作者，看到过或听闻过、学习过或研讨过列子的思想和论著，要不然不能凭空概括出这么重要的观点的。

《战国策》上亦载有关于列子的情况：

史疾为韩使楚，楚王问曰：“客何方所循？”曰：“治列子困寇之言。”曰：“何贵？”曰：“贵正。”

——《韩策·史疾为韩使楚》

《战国策》记载战国时期各国策士的言行，西汉时经刘向进行整理，其中虽有策士辩人游说时的浮华夸饰之词，但基本上是一部信史。《韩策》所载列子事，与《吕氏春秋》对列子的评价接近。

《庄子》中的《天下篇》虽不单独提列子，但是全书若干篇章都记述了列子的行迹、性格和思想，有的固然是寓言，如《逍遥游》，有的却是客观记载，如《应帝王》、《让王》；寓言描述的情形，可视为虚拟和假托，而客观记载的行历，尤其是“内篇”的记载则无可怀疑。

持论较为慎重的《四库提要》则说：“当时实有列子，非庄周之寓名。”又，《四库提要》据《尔雅疏》引《尸子·广泽篇》曰：“墨子贵廉，孔子贵公，皇子贵衷，田子贵均，列子贵虚，料子贵别囿……”，所引《尸子》语，正与《吕氏春秋》对列子的评述相同。

此外，班固的《汉书》在《艺文志》中，载有“列子八篇”；唐人颜师古注：“名圉寇，先庄子，庄子称之。”班固所指的“列子”，显然指的是其人，与“老子”、“关尹子”相并称，这说明列子之存在无可怀疑。颜师古据史料注列子，亦可相信。

据此可以断言，列子决非“列缺、鸿蒙”之属，而是实有其人。

列子生活于什么时代？根据《庄子》的记载，列子曾问道于关尹，那么至少与关尹同时或稍晚。而关尹又师老子，关尹与老子同时或稍晚。《史记》说：老子“与孔子同时”。这样一推测，孔

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（公元前 551 年），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（公元前 479 年），这正是春秋末，只差 3 年进入战国时期。可知，列子当活动于春秋末到战国初期，下限至多到周安王二十六年（公元前 376 年）。又据《吕氏春秋》：“子列子常射中矣，请之于关尹子。”说的仍与关尹子同时，即春秋末到战国初。这是推测列子活动时期的又一有力的佐证。

既然列子实有其人，又确实活动在春秋末至战国初期，为什么《史记》、《庄子·天下》和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等不记载呢？

这原因不难理解。

就《史记》而言，司马迁显然读过《吕氏春秋》，因为司马迁曾为《吕氏春秋》的组织者编纂者吕不韦作过传，即《吕不韦列传》。对于该书编纂、写作的过程，基本内容和大旨，成书后的情况，司马迁都是知道的，这就是说，作为先秦道家的重要人物列子，司马迁同样是知道的，虽不记载，但也未曾在《史记》的任何一篇中否定过；同时也说明，不载列子，并非司马迁的疏忽，只能认为是司马迁明知而有意不载。之所以会如此，或者由于司马迁没有搜集到列子更确凿更完备的材料，以致未加传述；或者由于在《史记》中对老子和庄子已经列传，只让道家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出现即可，因而不专述列子；再有，司马迁主要活动期为汉武帝刘彻的时代，这时社会上独尊儒术，对于西汉初年倡行的黄老（黄帝、老子）之学已经势力大减，几至学术界较少提及，加之司马迁时以及西汉初，人们没有或极少称引列子，因而司马迁不为列子作传也就可以理解了。

何以庄、荀的重要篇章也不提列子呢？《庄子》一书提到列子（称“子列子”、“列子”、“御寇”）达 10 多次，而唯独《天下》不提，则有以下原因：首先，《天下篇》经学术界认定，为庄子后学所附益，非庄子本人之观点，所以对于学派代表人物的取舍，已与庄子本意不谋；其次，对于学派代表人物只取主要的，认为不

是最主要的则不取，即使不提列子，文中提到了关尹、老子，又有专段提庄子（这是后学附益的根据之一），有了三个代表人物也就够了，事实上，《天下篇》对于每派代表人物也至多提三人，少则提二人，这样写体例上是一致的，不提列子也并不奇怪；再次，不提列子，并不说明《庄子》一书否定列子的存在、事迹和观点，正如《天下篇》未提孔子，也不说明对孔子的否定。

荀子的《非十二子》中未提到列子就更不足为怪了。其一，它是非难它嚣、魏牟、陈仲、史鰌、墨翟、宋钘、慎到、田骈、施惠、邓析、子思、孟子等十二子，并非对任何人都要指责一番，其中的孔子、老子、庄子等人就没有列入被非难之人里面。其二，对于学术流派可以有不同的看法，对其代表人物可以有取舍的不同标准，不能用某一观点强求荀子只能提这个，不能提那个，正如不能强求《天下篇》一定还要提管子、商鞅等人一样，所以荀子不提列子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其三，不提某某，同样不意味着此人不存在；列子是存在过的，只不过荀子不把他同道家一齐加以非难罢了。

《列子》的真伪

关于《列子》的真伪，历来是学术界聚讼不休的问题。

《列子》这一书名，先秦时代典籍所未见，直到东汉初的班固（公元32～92年）修撰《汉书》，才在《艺文志》中载有仅4字的一个条目——“列子八篇”。“列子”系指称其人，“八篇”系指称其文。这证明，信史所载列子者有八篇文章，是确凿无疑的，而《列子》一书千真万确曾流行于世。

在班固之前，西汉晚期的刘向（约公元前77～公元前6年），曾对《列子》一书加以整理编纂，取名为《列子书录》，共八章（即今所见八章篇名）。成书时间为汉成帝永始三年（公元前14

年)八月壬寅。这是最早对《列子》一书的记载。在《列子书录》中还有刘向写的一篇“序”。其中写道:“所校中书《列子》五篇,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(参,人名)校讎太常书三篇,太史书四篇,臣向书六篇,臣参书二篇,内外书凡二十篇,以校除复重十二篇,定著八篇。中书多,外书少,章乱布在诸篇中。或字误,以尽为进,以贤为形;如此者众。及在新书有棧(意为虫蛀断灭),校讎从中书已定,皆以杀青,书可缮写”云云。“序”里记载成书过程,似可相信。但是,不少学者却认为刘向的所谓《列子书录》以及“序”均为伪造,实不可信。

至晋代,出现一个张湛,并著有《列子注》一书,即今刊行于世的《列子》通行本。对于《列子注》为张湛所著无人怀疑;人们怀疑这本《列子》是否可靠,许多学者认定张湛注的《列子》为赝品,绝非先秦列子所撰之真品,也绝非刘向、班固所见到或经整理过的书稿。

《列子》一书,绝非先秦之列子所撰,这在学术界已成为定论。

证明《列子》非列子所撰的主要根据有以下几个方面:

甲,西汉刘向的“序”就已经提出了疑问。

乙,唐代柳宗元在《辨列子》一文中曾明确指出“其书亦多增窜非其实”。

丙,宋代黄震认为“其书八篇,虽与刘向校讎之数合,实则典午氏渡江后方杂出于诸家”(《东发日钞》)。所谓“典午氏”即司马氏,晋之司马昭;“渡江”指统一中国。就是说,《列子》是在晋王朝建立以后出现的,尽管篇目与刘向校讎的相符合,已非刘向时的原著。

丁,明代宋濂在其《诸子辨》中断言“书本黄、老言,决非御寇所自著,必后人会粹而成者。”

戊,清代姚鼐在《惜抱轩文后集·跋列子》一文中提出“《列子》皆非尽本书,有后人所附益”。

己，清代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在谈到《列子》之伪时说：“今考第五卷《汤问篇》中并有邹衍吹律事，……其不出御寇之手更无疑义。”又说：“凡称子某子者，乃弟子之称师，非所自称，此书皆称子列子，则决为传其学者所追记，非御寇自著。”

庚，清代梁启超说：“按理列御寇乃庄周前辈，其学说当然不带后代色彩，但《列子》中多两晋间之佛教思想，并杂以佛家神话，显系后人伪托无疑。”

辛，胡适在他的《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中举出《列子》最不可信的重要依据是：“杨朱大概不及见梁称王”。时间上的差错，证明《列子》系后人撰著。

壬，马叙伦在《列子伪书考》中，列举二十条理由，证明《列子》为伪书。

癸，杨伯峻《列子著述年代考》一文，从汉语史的角度鉴别《列子》成书的年代，断言“《列子》是魏晋人的贋品”。

此外，任继愈主编的《中国哲学发展史》补充《列子》为伪托的几条证据，确认《列子》为西晋中期作品。

以上仅是其有代表性的辨伪观点和根据。据此可以认定，《列子》确系贋品，决非列子所自著，也决非先秦时代列子之徒所记述。虽然是贋品，却又并非完全作伪，仍然保留了相当部分列子的思想和春秋战国时杨朱学派的思想，这是十分可贵的。作伪者是谁？出于什么时代呢？有的学者认为作伪人就是注释《列子》的张湛。这个论断，不敢苟同。张湛的《列子序》是可信的。他在整理断简残帙的时候，不可能不加入自己的观点，不可能没有他的编次体系。张湛在注释中不止一次地指出《列子》中的矛盾、失实、不明、重复和诬贤的地方，倘若是他自己作伪，何以要这样做呢？我认为，作伪者，可能是西晋中期，善于清谈、崇尚黄老、兼容各家、葆有玄风、放荡形骸的知识分子；究竟是谁，却无从确考。仅从内容和语句等方面进行考察，可以看出其思想乃汉末

或晋代清议、玄风煽起时的知识分子所独有。书中广采博收，许多地方写得楚楚动人，且观点明快、文采朴质、风格统一，非一般学者所能为，乃饱览群书、融通古今、笔墨酣畅之士才能写得出。尽管《列子》是赝品，却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，它的一系列寓言、故事特别精美，甚至在语言表达的某些方面超过《庄子》，有着较强的艺术魅力，因此，人们不愿抛弃它，并进而阅读、研究它，以致成为近两千年来传世的不朽著作。

《列子》的学术价值

《列子》是一部学术著作。

这部著作曾经显赫一时，并直接为封建帝王所推崇。西汉刘向说过，汉景帝刘启之时，贵黄老之术，《列子》“颇行于世”。因为《列子》的哲学思想，正是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，对于刘汉王朝的巩固有实际意义，于是《列子》在孝景时“颇行于世”，也就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。到了李唐王朝，高宗乾封二年（公元667年），追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，并以老子姓“李”，同李氏一族而引以为荣。玄宗开元二十五年（公元737年），置崇玄学于玄元庙，习诵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文子》、《列子》（号称“四玄”），并于天宝元年（公元741年）追封《列子》为“冲虚真经”。《列子》被抬举到空前的地位。宋代也曾倡行道家哲学。宋真宗赵恒，在“冲虚”二字下再加“至德”二字，名为“冲虚至德真经”。徽宗赵佶政和六年（公元1116年），立道学，诏太学辟雍，置《内经》、《道德经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列子》博士，并以《内经》和《道德经》为大经，《庄子》和《列子》为小经。唐宋时，《列子》尽管受其崇敬，但它的哲学思想，却被封建统治阶级曲解、利用了，被披上神学迷信的外衣，亵渎了它的质朴和纯洁。现在是应该廓清并让其学术思想取得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时候了。

《列子》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：

一、对老庄学派的继承和发展

老庄学派对我国的哲学发展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。发展到汉末魏晋时期，出现伪《列子》一书，从道家学派的哲学观来看，则是老庄学派的直接继承。

《列子》的宇宙观，完全建立在老庄哲学的基础上，同时又吸收汉魏各家的观点，综合成自己的宇宙观。

首先，《列子》坚持“道”是万物始祖，又是实体事物的朴素唯物观点。在《天瑞》中，明确地说，“道”就是“天地之根”；它产生万物，它自己却不生不化，其功能是“绵绵若存，用之不勤”。这“天地之根”，同老子所说的“天地之母”是一个概念，相等的涵义。“道”，是实体物质，虽然它被视为玄而又玄的东西，但是它却是“气”所形成，天地万物均“积气之成”。这与庄子的“道气”说完全一致。这可见《列子》对《老子》和《庄子》继承的主导方面。

其次，《列子》吸取了《周易》中的某些观点，提出宇宙生成和发展的阶段论。《周易·系辞上》说：“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”。这是“道”的变化发展阶段。《列子》坚持这种发展阶段论，却不生硬套用，而是提出了新颖的见解。《天瑞》说：“有太易，有太初，有太始，有太素”，从“太素”以后，物质世界便开始形成。有了物质世界，宇宙仍然发展，“易变而为一，一变而为七，七变而为九”。《列子》比老庄进一步揭示这几个发展变化阶段，均由阴阳制约，各阶段互不孤立，是“未相离”而有着内在联系的。

再其次，《列子》还吸取了魏晋时人王弼等关于宇宙本体论的思想成果，以自己的见解，加入到玄学的论辩之中，把各家学说熔为一炉，而成为一种创新的见解。

此外，《列子》还提出关于物的先后巨细长短、物存在的形态、

物的增减、时间空间有无极限等带根本性的哲学问题。《列子》对这些问题的回答，基本上立足于老庄学说；同时也融合了其它学派的一些观点，显得新颖而有意义。许多见解，在《列子》以前很少看到，这不能不说是老庄哲学思想的一个发展。

二、在魏晋哲学史上，《列子》是整个玄学的有机组成部分

东汉后期兴起士人的清议之风，品题人物，发表政见，议论朝政，士人以此为清高，乐于清议，甚至结为小团体。这种清议，往往与黄老、佛释相结合，或者说是用道、释的一些观点来议论时事，品评人物，逐渐地走向“玄”的道路。加之东汉晚期两次“党锢之祸”的沉重打击，使相当一部分士人不再敢于大胆议论时政和人物，便把自己的不满和愤激，用老庄思想包裹起来，埋头去探讨“三玄”（《黄帝内经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）哲学，表达自己对宇宙生成、物质本体、自然人事等的基本观点，这就形成魏晋时期玄风炽烈的局面。而《列子》一书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出来，并加入了“玄言”的时代大合唱。

按照笔者的观点，《列子》一书写成于西晋中叶以前。从成书的时代说，《列子》是从何晏、王弼“贵无”论发展到郭象“独化”论的一个组成部分。而《列子》学说的建立，并没有抛开以前的思想成果，它是以善于吸取思想养料，综合融化，建构自己思想殿堂而著称的。而《列子》的哲学大厦，就正是建立在“贵无”的基础之上。《天瑞》一再强调的“未尝终”、“未尝有”、“未尝发”、“未尝显”，显示的就是“无”的情形；而“无不知”、“无不能”，强调的则是“无”的功用，它能产生一切、制约一切，这就是“贵无”的基本观点。但是，《列子》并未到此为止，它还吸收了“独化”论的思想，变为自己的哲学观点。认为万事万物可以自由地生，自由地化，受一种盲目的自然规律所支配，任何人力都无法抗御。《力命》中说的“自寿自夭，自穷自达，自贵自贱，自富自贫……”，“自生自死，自厚自薄”等等，都是“独化”的

表述。这样，《列子》便从天道到人事、从宇宙观到社会观，展开它的思辨玄理，成为魏晋玄学发展第三阶段“独化”论的有机组成部分。

三、独特的社会人生观，较为完善的社会人生理论体系

《列子》的社会人生观，仍然有承袭老庄、何王的一面。老子的政治观是“无为而无不为”。王弼指出，这就是“崇本以息末”（《老子注》）的表现。全部《列子》的政治观，完全是老子、王弼政治观的翻版。

这种政治观的思想内涵是“无为而治”，但是根本问题在于“怎样”无为，方能达到大治的目的。这里，《列子》确定了以君王、圣贤为核心，由他们施以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措施来实现治国与治民。

在人生观方面，《列子》取阮籍、嵇康等人放达肆情的态度，对礼义名教，基本上加以嘲弄和否定。

《列子》的人生观，在学术界引起最多非议的是《杨朱》一篇。认为《杨朱》反映了魏晋封建门阀士族的荒淫无耻的生活方式，露骨地宣扬腐朽的纵欲享乐思想，是一剂腐蚀人们心灵的毒药。

这个观点有其正确的方面，也有其偏颇的方面。说它正确，因为《杨朱》宣扬的就是纵欲和享乐，教人们不要“苦其身，焦其心”，“徒失当年之至乐，不能自肆于一时”。说它有偏颇，是因为对《杨朱》乃至对整部《列子》尚未作全面具体地研究，未能深刻说明它的享乐纵欲与魏晋门阀士族的淫乐虽有相同之处，却又有很大差别，这就是它独特的人生观和理论体系之所在。

《杨朱》宣扬的享乐主义，有一条明显的思想线索——任其自然。这是有积极意义的。首先，是继阮籍、嵇康之后，举起的又一面反名教、反传统的旗帜。《列子》的作者大约属于不得志的士子，面对着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势族”（刘毅《疏》）的现实，加之连年的残酷战争，关中连年的饥荒，士人朝不保夕，便只好任

性而为，反对人为的束缚和压迫。这种与封建当权者不合作，反对礼教传统的思想，其积极意义也就十分明显。其次，享乐和纵情的人生态度，核心是“为我”。这直接同魏晋时期的宗法制度，同道德仁义的说教相对抗，让人们重视自身，维护个人利益，尊重独立人格，这已经是人的初步觉醒时期的人生态度和理论形态，无疑地有着历史积极意义。再其次，是保护心灵的健康、纯洁而坚持的人生态度。《杨朱》宣扬的享乐纵欲，是以“全性保真”为前提的。只有这样做，才是个人修养的根本，是善于“治内者”；只有这样做，才是“不违自然之所好”，因而也就没有任何牵累；只有这样做，才是真情而不是“矫情”，心灵不受闭塞，不掺杂质。《杨朱》也并不主张纵欲无度，并没有达到荒淫无耻的程度。它明确地指出，“无厌之性，阴阳之蠹也。”贪得无厌，逸乐失度，就走向反面，成为害人虫了。

《列子》的寓言艺术

《列子》不仅有较高的学术价值，其寓言故事也有着较高的艺术水准。

整部书，共有寓言故事 102 个，可谓丰富多采。这里，有表达理想追求的，如《终北之国》等；有说明深刻哲理的，如《愚公移山》等；有讲养身治世的，如《黄帝神游》等；有反映高超技艺的，如《偃师造人》等；有探索自然奥秘的，如《两小儿辩日》等；有论证符验的，如《黑牛生白犊》等；有神灵幻象的，如《西极化人》等；有讽刺批判现实的，如《华子病忘》等；有生活小趣闻的，如《齐人攫金》等；还有其他一些难以归类的寓言故事。有的寓言故事，可以说是《列子》的杰出作品，影响极其深远，如《愚公移山》；有的寓言故事发人深省，意味隽永，如《景公游牛山》等；有的表现技艺精微，顿觉艺无止境，如《纪昌学

射》等。但是，有的寓言故事也平淡无奇，仅仅是一般的说教，如《力命相辩》；还有一些寓言故事，或者照抄以前的书籍，或者只作适当改写，或者掐头去尾为我所用。不过，从总体上说，《列子》的寓言故事是有其创造性，有其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，在我国寓言故事发展过程中是有其重要地位的。

一、高度的创造性，把寓言故事形式推向精美的发展阶段

具有高度创造性的寓言故事，无疑地是指《愚公移山》、《杞人忧天》等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其一，体现了真理的美。寓言故事固然有许多方面令人赞美，但是它的真理光辉却是美的核心和本质。《愚公移山》，表达了劳动者坚韧不拔、矢志不移、团结胜利的崇高品德，读了以后让人精神振奋。《杞人忧天》，则表现人们探索宇宙奥秘、追求真理的美好情操，让读者理解远古时候人们就已经在建立朴素的唯物宇宙观了。其实杞人不应该是被讽刺的对象，恰好是大胆设疑，勇于求知的人物。其二，有一个矛盾展开和获释的过程。矛盾处于对立状态：愚公与自然的对立，愚公与智叟的对立，忧者与晓者的对立，人与宇宙的对立等，对立面的双方经过一定的发展过程，开始转化，并导致满意的结果。这正是辩证法的美的形象表达。其三，有着完整的情节，有着合理的结构布局，有着独立的寓意深刻的哲理内容。这样的寓言故事，几乎可以成为脱离《列子》的母体而独立成篇，使寓言故事走向更加完整和成熟，成为有别于其他文章体裁的样式。这对于先秦两汉魏晋的寓言故事多为设喻、警戒、不离母体来说，无疑是更富于创造精神的。

二、既有积极的浪漫精神，又有强烈的现实精神

它的浪漫精神，不仅吸取先秦两汉典籍中关于神话传说、幻想寓言的养料，而且有其独立的人格力量，有其超越现实的理想追求，有其瑰丽奇谲的想象和夸张。《黄帝梦游华胥国》，这当然是从远古神话传说演变而来的，但是却展示了与远古神话传说不